

天堂的建构者与地狱的肇端者

——罗赞诺夫视域中的普希金与果戈理

吴 琼

(黑龙江大学 俄语学院, 哈尔滨 150080)

摘 要: 罗赞诺夫的文学批评摒弃了传统的“经院批评”模式,代之以感性、直觉的随笔形式传达文学感悟。他的批评视角独特,观点鲜明,彰显着浓厚的主观性。他倾向于借助对比凸显作家创作的个性特色,他将普希金与果戈理置于对立的两极,认为前者创造了一个真实、鲜活与光明的世界,而后者则编织了一个幻想、僵死与阴暗的世界。罗赞诺夫创建了“生活的宗教”,他的批评凝聚着对宗教、文学与社会问题的思考,而这些思考皆透过生活之棱镜的折射。

关键词: 罗赞诺夫;文学批评;普希金;果戈理

中图分类号: I512.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971(2014)05-0075-06

引 言

罗赞诺夫(B.B.Розанов, 1856—1919)是俄罗斯白银时代著名宗教哲学家、批评家、作家、政论家,“新宗教意识”的创始人之一。他的著述涉猎诸多领域且庞杂无体系,其中文学批评活动则贯穿一生。罗氏并不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批评家,他不进行严密的科学研究,不创作系统的、脉络清晰的批评理论专著,不追求以完整的视角阐释作品。他拒斥逻辑与思辨的教条式批评,而是倾向用一种感性、直觉的随笔方式发表自己的文学感想,以实现对文学最鲜活、最直接的诠释,这也使其批评凸显了浓厚的感情色彩,渗透着鲜明的主观性,具有印象主义批评的特征。同时,重身的身份又使其处于宗教哲学、社会政治与文学事件的中心,导致他经常将实事问题、宗教哲学思想、文化阐释、与他人的论战等元素融入文学批评之中,

以借助批评阐释问题,因此他的许多评价大多是自身理论的加工与延伸,这也赋予其批评一定的兼容性,使其批评视角与写作风格又区别于真正意义上的印象主义批评。罗赞诺夫的评价呈现动态表征,时常会发生变更、前后矛盾的现象,其变化“主要取决于批评家历史观念的转变”^[1],这也印证了罗氏用批评阐释哲学与文学主张的方法。

罗赞诺夫崇尚19世纪古典作家,对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批评贯穿其一生。罗氏倾向对比研究,经常将两位作家置于对立的两极,以凸显作家的不同个性与特色,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展现了其批评的主观性与创造性。批评家在很多文章中都对普希金与果戈理进行了比较分析,许多视角在当时都可谓颠覆性的,时至今日仍不失特色。本文将通过探究他对两位作家的批评,着力揭示其独特的思想倾向与文学主张。

收稿日期:2014-04-28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青年学术骨干支持计划项目“罗赞诺夫的文学批评研究”(1253G038);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年度规划项目“罗赞诺夫的文学批评思想及诗学特征研究”(13C039)

作者简介:吴琼(1982—),女,黑龙江鹤岗人,讲师,从事俄罗斯文学与文论研究。

一、真实与臆造的世界

罗赞诺夫崇尚自然、真实,反对虚构杜撰,厌恶一切虚假与造作。他赞赏普希金,认为他的创作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没有病态的虚构以及不真实的情感。普希金规避了任何刻意的成分,他创作的一切现实都是自然的。他的话语永远与事实相符,这些话语隐藏在后面,通过现实以形象、轮廓呈现出来。诗人不会创作凌驾于现实之上的第二个世界,也不会将该世界与现实混淆,使后者屈从于前者的病态想象。罗赞诺夫认为普希金作品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葆有从生活中移植过来的现实,并折射出源自生活与现实的美。他极为推崇普希金的晚期作品,他认为《叶甫盖尼·奥涅金》(后半部)、《别尔金小说集》、《上尉的女儿》中都对现实“持有的冷静、朴素的态度”,该态度“在此后的文学中占有统治地位,谢尔盖·阿克萨科夫的《家庭纪事》与其紧密相连,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罗斯托夫与鲍尔康斯基的家庭线索也与其毗邻,《悬崖》、《贵族之家》和《奥勃洛莫夫》(部分)作为家庭纪事的典范,是在其基础上的进一步浓缩或个性化的发挥,而罗亭、巴扎罗夫等形象则与生活的根基相断绝,偏离到另一个方向,因此是畸形的”^[2]。他认为普希金的诗歌给生活增色,使生活发光,但不会去干扰生活、歪曲生活,也不会违背人的自然天性。普希金不仅仅提供了正确对待生活的范例,还呼吁人们去关注生活与现实。实际上,罗氏对普希金创作与现实之间关系的评价正是基于其倡导的文学模式,他推崇的正是源自生活与现实的创作。

罗赞诺夫提出,普希金使我们的情感更纯净、更高尚,从而远离精神上的污浊,但他没有将任何精神规范强制地付诸到我们身上。每个喜欢他诗歌的人,都会保持独立的自我。所有这一切都使他的诗歌成为典范,并指明了健康发展的方向。只要遵循这些方向,一切便都不会变形、歪曲。无论生活变得多么复杂,我们都不会偏离轨道,不会失去最初的统一与完整、平和与明确,只会愈发充实,丰富,深刻,并不断地趋于完善。

与普希金相比,罗赞诺夫认为果戈理的作品并不是对现实的描摹,而是脱离现实的,是作家费力想象的产物。“从果戈理的信件到小说,都是臆造的,都会使你感到造作,因为果戈理并不是发自内心地讲故事”。同时,“他的大脑又被与现实没

有任何联系的梦境所萦绕。他对现实没有任何热情,开始选取了真实的事物,但立刻感到厌倦、无聊,只留下题词或标题,因而他的创作都是对现实的幻想”^{[3] 242}。在罗赞诺夫看来,果戈理拥有一个自己的主观世界,看似与现实世界非常相像,实际上,这是一个由他臆造的、不真实的、歪曲变形、充满幻想与魔法的世界。罗氏认为该世界根植于病态的想象,建构在荒诞的法则之上。因此,他得出结论,果戈理的创作是粗陋的现实与病态的幻想之间的结合。

在《米·尤·莱蒙托夫(逝世60周年纪念)》(1901)一文中,罗赞诺夫以《可怕的报复》为例分析了果戈理作品的超现实性,“从第聂伯河的河心眺望高耸云霄的山岳……那些山不像山:它们没有山麓,极目四望,全是峻险突兀的尖峰,无论在山脚或山巅,都展开着高不可溯的苍空。山岗上的树木也不像树木:倒像是长在林鬼毛茸茸的脑袋上的长发。往下去,林鬼在溪水旁边洗涤他的须髯,无论在须梢或发尖,又都是高不可测的苍空。草原不像草原:那是拦腰把圆圆的苍空围绕起来的一条绿带子,无论在它的上方或下方,都浮泛着一轮皓月。”他认为果戈理的这些描写都是在肆无忌惮地幻想,幻想着另一个看不见的世界,“第聂伯河附近没有任何山,无论如何也不能说高加索有山峰,没有山麓”^{[3] 242},在他看来,作家实际上知晓一切,只是故意模糊弱化了现实与幻想之间的界限。罗赞诺夫认为果戈理拥有强大的魔力呼唤读者走向幻想,并把幻想当作现实,这主要源于他通晓描绘现实的艺术奥秘,他“讲得如此精彩,以至于无法把它作为一个形而上的事情而不相信”^[4]。批评家指出,例如“整个大地笼罩着柔和的光辉”这句话就充满了魔力,使读者立刻产生安宁静谧之感。因此,即使果戈理所描写的事物并不真实,却还是会令读者心醉神迷。

批评家从形而上的角度审视了果戈理的神秘主义天性,他认为在果戈理身上“此世”与“彼世”两种生活并行存在,但他“深深地远离尘世,似乎忘却了尘世”,他的本源世界还是彼世的。因此,果戈理天生善于洞察我们看不见的幻象,并在创作中表现出来。正如作家自己所言:“我的内心完全紊乱了,比如,我一看到有谁跌倒了,我的想象立即就会抓住这一点,开始加以发展,并且把一切都发展成最可怕的幻影。这些幻影折磨着我,使我夜不能寐,弄得我筋疲力尽。”^{[5] 268} 罗赞诺夫将

其视为果戈理拒斥现实主题的原因。他还指出,这些幻象与果戈理自幼形成的关于宗教和神圣的概念并不相符,他因此而恐惧,于是出于反感,冠之以“巫师”、“恶魔”、“魔鬼”的标签。可见,罗赞诺夫所说的这些幻象指的果戈理眼中的魔鬼,或是罪孽深重的人们。

通过上述的对比我们发现,罗赞诺夫强调普希金与果戈理站在本质上对立的两极,主要根植于其视域中两位作家对待现实的不同态度。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普希金的赞誉从反面映衬了对果戈理的批判。因此,他颠覆了将果戈理视为“自然派”奠基人这一传统的文学观念,并用普希金置换果戈理的位置,实际上正是源自对果戈理作品“真实性”的驳斥,“从果戈理开始,我们的社会就失去了现实的感觉,并由此开始出现了反对现实的因素”^{[5] 134}。他认为60年代批评家们对果戈理的诠释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狭隘的、虚假的,他们的文学评论都带着虚伪的面具,完全不理解对待生活的艺术态度。“强调果戈理与时代环境联系的人是把世界文学上一个最伟大的非现实主义作家变成俄国现实主义的部门主管。”^[6]因此他们才会贬抑普希金,强加给果戈理一副不真实的面具。在他们盲目、偏执的引导下,普希金的光芒被熄灭了,并随之陨落了。

上述的阐释都根植于罗氏独特的批评体系,他无法理解任何没有现实基础的文学,因而拒斥果戈理的作品。他重视文学与生活的联系以及相符程度,因而推崇普希金的作品。他认为,“文学能比任何别的东西更深刻、更真实地反映生活。艺术家或诗人就像是不自觉的智者,能够在他所描绘的形象或转述的事实中聚集生活的分散的特征,有时能抓住这些特征的最深刻的本质,甚至能猜透它们的原因。”^{[7] 3}可见,罗赞诺夫倾向文学与生活的联系,重视文学的现实基础,这主要源于他对生活的态度。罗氏创造了“生活的宗教”,习惯于透过生活思考宗教、文学问题,他“探讨问题的动机和根据皆源于生活本身,源于亲身的生活体验”^[8]。因此,文学与生活、现实的关系是罗氏批评的出发点。

二、鲜活与僵死的世界

罗赞诺夫认为普希金的世界是鲜活的、生动的,他带给读者的感受从不是一成不变的,他象征着永远都在发展变化的生命,因而他的创作历久

弥新。普希金笔下的语言与场景就如同波浪拍打着心灵,浪花时涨时退,冲刷着心灵,使其焕然一新。在他的影响之下,我们的心灵会自然地闭合与生长,永远输送新鲜的血液。在《重返普希金》一文中,罗赞诺夫指出,普希金比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更现代,“我们在阅读《黑桃皇后》、《杜博罗夫斯基》的时候,始终兴趣盎然,似乎它们是刚刚写成的,这些作品的语言,作者内心对人物、社会关系的态度都没有丝毫陈旧之处,这简直就是奇迹。当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渐渐变得陈旧,普希金却丝毫没有变老的迹象”^{[3] 327}。究其原因,罗氏认为在于普希金心灵非凡的完美,“只有心灵纯洁并一生纯洁的人才是真正的作家。作家不能后天造就。作家乃是天赐。纯洁的普希金就是一个。《上尉的女儿》中没有一句话是陈旧,过时的,虽然它已经八十岁了!”^{[9] 80-81}他认为普希金永远带给人新鲜的感觉,即使“已经熟知他作品的每一页,每一个场景,还是要反复阅读,而且百读不厌”。他说自己是在“吃”普希金,将其比作食物,这种食物“已进入我的体内,在我的血液里流淌,使大脑变得清新,使灵魂变得纯净”^{[9] 195}。可见,罗赞诺夫认为普希金的创作是流动的,充满张力的,能够净化人的灵魂。同时,还是多样化的、丰富的,“他是创作所有诗歌形式的天才,他能自如地运用八行诗和抑扬格,他的心灵是融合了全世界音响的共振器。他从完整的世界中撷取声响,并将新的音乐涌现出来,从而使世界更为丰富,在普希金之后,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3] 245}。

相比普希金,罗赞诺夫认为果戈理的世界则是僵死的、停滞的。他创作的场景单调、乏味、千篇一律。在他的作用之下,我们的灵魂不增大,也不减小,有一天却突然断裂了,此后将会永远保持这一状态。罗氏写道:“如果想要揭开果戈理的秘密,那么请翻开《死魂灵》的第一页,我们便会发现它毫无生气。这是一种味同嚼蜡的感觉,其中什么也没发生,一个词也没有凸显出来,力图比别的词多表达一点意思。无论我们将书翻到哪一页,碰到多么有趣的画面,我们都会看到这张僵死的语言之网,所有的人物都被罩在其中,就如同被一件共同的白色殓衣所覆盖。”^{[3] 162}可见,批评家着力强调果戈理创作内容的无张力性,并凸显他营造的“凝固”、“死寂”的整体氛围。

罗赞诺夫还指出,在果戈理作品中存在大量对自然的描写,但他从不描写暴雨、风、树叶婆娑

或者青草的摇曳,自然在他笔下是静止的,毫无生机的;他也不描绘云朵漂浮的天空,天空在他笔下永远是单调的,蓝色的,他的词汇永远留给“凝固的”空气。罗氏认为果戈理永远只以不自然的、抽象的笔触呈现全景,而从不将目光投射到大自然当中美好的、迷人的动态部分。如果将其与普希金的自然描写相对比,就会发现后者真正了解热爱大自然,其笔下的许多细节都能打动人心,使读者产生共鸣。而果戈理的描写使人感到主人公并不去关注自然,自然与人物性格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从人物层面来说,普希金创作的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鲜活的面孔。果戈理塑造的形象则都是僵死的,是一幅幅不运动、不变化的肖像。他们只有黯淡、苍白的轮廓,没有丝毫的生气与热情。果戈理从来不描写人物性格的发展、情感的变化、观念的转变。罗氏对果戈理笔下人物表征的阐释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人物具有形态上的生动性,但逼真却没有生命。第二,这些人物都原封不动,他们的思想也没有延续或发展的过程。他们呈现给读者的微弱变化,只是表面上的假象,是作家强加给人物的造作、虚假的变化。第三,以《死魂灵》为例,所有的人物都是木偶,是“活着的死人”,只有泼留希金还留存着一丝人的特质。至于其他人物,玛尼洛夫没有任何个性特征,如同一幅凝固的面具,柯罗博奇卡、索巴凯维奇、诺兹德廖夫三人的形象也都十分扁平,都可以用某些典型特征进行概括。但总体而言,泼留希金还是与其他人物形象具有相同的共性特征,即缺乏鲜明的个性,与真实鲜活的人不相符。果戈理善于放大人物的某些特征,从而使人物具有典型性,这也是罗赞诺夫强烈拒斥的。批评家推崇塑造符合人的本性、展现人的真实面貌的人物。这实际上涉及到罗氏思想关照下的典型性问题,也是其衡量作品价值的重要标尺之一。罗赞诺夫认为塑造人物形象不应遵循固定的模式,不应仅仅描绘人物的某些平面化的单一特征,从而将人物框定在典型的范畴内。秉承这一观点,他拒斥现实主义倡导的“塑造典型环境中典型性格”的艺术主张。

三、“多神教徒”与阴郁的“魔鬼”

罗赞诺夫认为普希金象征着光明,给人以温暖,他是人类一切美好情感最有力的表达者。罗氏非常欣赏普希金带给人的愉悦、惬意的心境。

“他只要对我们的恼怒吹一口气,我们的恼怒就会化为微笑。”^{[3] 251}他认为普希金拥有神奇的力量,能将忧伤、苦恼都转化成明快的旋律。吉皮乌斯曾经这样评价罗赞诺夫:“生性怕冷,喜欢温暖和光亮。”^[10]这也许是他崇尚普希金的原因之一。他认为普希金的思想是至纯的、静谧的,没有丝毫的痛苦与不安,在他的世界里,不会出现“死亡”、“非生”这样的词汇。

相反,果戈理在罗氏看来则长着一颗阴郁的心灵,他观察世界的眼光是昏暗的、反面的,他的内心总是盘旋着难以解释的不安,批评家认同果戈理是“忧郁之父”的说法,“这种忧郁的界限还无法衡量,它的尽头也未可知。但它深深地改变了俄国的灵魂”^{[7] 352}。他认为这位表面上快乐的讲述者背后隐藏着一双忧郁的眼睛,一直阴沉地、奇怪地看着世界,因此他看到的都是昏暗的、鄙俗的现实,同时他还将自己的不安、苦痛、忧郁散播到整个俄国。

罗赞诺夫主张将普希金归入多神教之列,他认为这是由诗人真实与坦诚、光明与快乐的天性决定的,他体会不到人与生活的痛苦。在他看来,多神教是白色的、光明的、幸福的、喜悦的。基督教是黑色的、黑暗的、苦痛的。多神教不是一种外部的力量,驱使人们去信奉它,而是一种来自人内心的力量,使处于美好状态的人们自然地趋向它。因此幸福的人是天生的多神教徒,而当人们承受苦痛的时候,便会选择主张摒弃人性、苦涩的、冷酷的基督教,“心感到疼痛的时候,便顾不上多神教,请问,有谁会怀着一颗疼痛的心去关心多神教呢?”^{[3] 130}因而苦闷的人是天生的基督徒,“当果戈理曾经是‘多神教徒’的时候,他是光明、欢笑和喜悦的泉源,可当他成了‘基督教徒’以后,却使得他周围所有人的心灵感到无以言表的压抑和忧伤”^{[11] 35}。也就是说,当果戈理创作《狄康卡近乡夜话》等作品时,他是快乐的,带给人欢笑,而当基督教思想主导他以后,便陷入不休止的折磨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罗赞诺夫将普希金归入多神教的主张,实际上是驳斥基督教的一种表现形式。罗氏深切地爱着“此岸”的世界,他指责基督教不承认有温暖与爱的世界,竭力地用世界的痛苦战胜欢乐。他认为普希金也同样爱着这个世界与人们,并倾其一生去理解爱、解读爱,因而他笔下一切都是美好的、生动的。诚然,批评家崇尚普希金身上所承载的爱,认为它能够涤荡人的灵魂。诗

人对一切都饱含着爱,这似乎契合了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但在罗氏看来,普希金所体现的宗教精神并不是官方基督教宣扬的虚假教义与冷漠理论,而是“真正的爱的精神圆满的化身,是不需要任何道德伪装的、承载着真正的宗教精神的人间体现,是与历史基督教相对立的存在。”^[12]罗氏呼唤爱、美和宽容,拒斥假仁假义、残酷和冷漠的、充斥生硬教条的历史基督教,这也印证了其“新宗教”主张之根源。

列昂季耶夫曾经开创性地提出,俄国文学在果戈理之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普希金开创的优雅的语言模式被扭转了,美的概念,人与人之间健康的关系消失殆尽。俄国的作家与诗人在果戈理的影响之下,开始纷纷描写缺陷、弊端、社会的溃疡。令人震惊地展现着与现实没有任何关系的精神病疾。罗赞诺夫继承并发展了列昂季耶夫的观点,他将果戈理比作“魔鬼”,打破了普希金描绘的“光滑如镜的海洋”,“用棍子搅动海底,于是从海底升起一股股浊流,沼泽的气泡”^{[9] 124}。他将普希金定位为“创造型”作家,将果戈理定位为“破坏型”作家,从而将二者对立起来。他认为前者挖掘出俄国的灵魂之美,后者则递给俄国一面镜子,使整个俄国在镜子里变了形,其中呈现的是丑陋的、肮脏的魔鬼之城;前者给人以慰藉,“使人摆脱愚蠢、不安、自我怀疑、内心徒劳的骚乱”^[13],而后者却呈现了一番无法使人安慰的景象,他自己也为此痛哭流涕,并使灼热的泪水流经俄国的心脏。于是俄国的读者把“死魂灵”当成整整一代人的真实反映——“行走的死魂灵”,并厌恶这代人,罗氏认为这是果戈理对俄国最消极的影响。批评家认为如果《死魂灵》是由普希金完成的,我们一定会看见另一番情境,会听见《叶甫盖尼·奥涅金》与《上尉的女儿》当中那样美妙的笑,而不是“看不见的眼泪”以及“在冰层之下的笑号啕痛哭”。

罗赞诺夫在果戈理身上洞察到了否定情绪的滋生,并在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萨列夫、谢德林等“继承者”身上繁殖蔓延,因而他将果戈理称为“虚无主义”的创始人。在罗氏的观念中,“虚无主义”还指涉讽刺情绪。罗赞诺夫认为纯净的普希金与讽刺情绪是完全绝缘的,俄国文学中的讽刺风格是由果戈理开创的,“他创作了这样的形式,一旦陷入这种形式之中,就会将原初的、自然的形式忘掉,我们的思想与情感在几十年内都会

保持这种状态”^{[14] 159}。从此,所有不符合果戈理精神的创作就会显得苍白无力,而符合其创作的,尽管本身平淡无奇,却能滋长并占据位置。讽刺倾向逐渐笼罩一切,虽然一些观念被摧毁了,另一些观念生根发芽,但实际上所有一切都是同源的,都是由讽刺滋生并孕育出来的。他写道:“我们流动的文学已经被讽刺倾向削弱得奄奄一息,普希金的诗歌可以作为反对这一过度模仿果戈理讽刺倾向的最好武器。”^{[14] 160}然而,俄国文学并没有延续普希金开创的光明方向,果戈理对一切的讽刺不止一次使最高的热情凝固。罗氏拒斥讽刺倾向,他认为讽刺即否定,果戈理对俄国讽刺性的描绘,实际上是对它的否定、贬抑,从而消融了理想,使一切伟大、美好、辉煌都变成虚无。这将会导致国家传统生存根基的断裂,催生出反对派与革命情绪,引领俄国走向灭亡。因此罗赞诺夫提出,所有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都具有破坏性的反国家、反民族性。

罗赞诺夫对果戈理讽刺的厌恶,究其原因,在于他厌恶一切对俄国人的嘲讽与鄙视。即使人本身并不是完美的,有时甚至是可鄙的,但他还是无法接受对人的嘲弄。“虽然他所描绘的社会是愚蠢和卑贱的,虽然这个社会值得嘲笑;但是,难道这个社会不是由人构成的吗?”^[15]在罗赞诺夫看来,果戈理的嘲笑是对人的贬损、中伤,是对高尚品质的消解。如此,人将会丧失尊严,甚至失去个性,这都是他所无法容忍的。

结 论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发现,罗赞诺夫的许多批评都是在以直觉的方式传递感受,主观倾向性浓厚,他对普希金与果戈理的批评也彰显了这一鲜明的特色。他推崇普希金创作的真实、鲜活、光明的世界,无法接受果戈理虚构、僵死、停滞、阴郁的世界,果戈理“打破了普希金创立的和谐、爱、自由和美的世界,用魔鬼、魔法、庸俗、恐怖、忧郁和引人大笑的幽默与嘲讽压倒了一切。他仿佛是专为颠覆普希金的传统而闯入文学艺术圣殿的”^[16]。因此,罗氏对二者的许多批评都是对立的,互相映衬,赞赏普希金,旨在贬抑果戈理,从而宣扬自己的文学与宗教哲学观点。

参考文献:

[1] КИБАЛЬНИК С. А. В. В. Розанов “за” и “против”

- Пушкина[J]. Новый Журнал, 1993, (1): 96.
- [2] РОЗАНОВ В. В. Легенда о Великом Инквизиторе Ф. М. Домостоевского Под Общ. Ред. А. Н. Николукина [М]. М.: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6: 242.
- [3] РОЗАНОВ В. В. Мысли о Культуре [М]. М.: Современник, 1989.
- [4] 耿海英. 别尔嘉耶夫与俄罗斯文学[M].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9.
- [5] 袁晓禾. 果戈理评论集[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3.
- [6] [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尼古拉·果戈理[M]. 刘佳林,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6.
- [7] 田全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启示录——罗扎诺夫文选[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 [8] 赵桂莲. 用心感知, 让心说话——论罗赞诺夫的创作价值观[J]. 北京大学学报: 外国语言文学专刊, 1999: 137.
- [9] [俄]瓦·洛扎诺夫. 落叶集[M]. 郑体武, 译.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8.
- [10] [俄]吉皮乌斯: 往事如昨——吉皮乌斯回忆录[M]. 郑体武, 等, 译. 北京: 学林出版社, 1998: 150.
- [11] РОЗАНОВ В. В. Религия. Философия. Культура [М]. М.: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2.
- [12] 赵桂莲. 俄罗斯白银时代普希金研究概观[J]. 国外文学, 2000, (2): 44.
- [13] НИКОЛЮКИН А. Н. Наследие В. В. Розанова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Материал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С]. М.: РОССПДЖЭН, 2009: 129.
- [14] РОЗАНОВ В. В. О Писательстве и Писателях [М]. М.: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5.
- [15] [俄]罗赞诺夫. 论宗教大法官的传说[M]. 张百春,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7: 3.
- [16] 金亚娜. 并非不可解读的神秘——果戈理灵魂的复合性与磨砺历程[J]. 俄罗斯文艺, 2009, (3): 3.

The Creator of Heaven and the Constructor of Hell

—Pushkin and Gogol in the View of Rozanov

WU Qiong

(College of Russian Language,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Rozanov's literary criticism abandoned the traditional model of scholastic criticism, instead he employed the form of perceptual and intuitional essays to express his literary thoughts. His perspective is unique, opinionated, and showing strong subjectivity. He tended to highlight the writer'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ir writing by contrast. He put Pushkin and Gogol at opposite poles, and considered the former created a real, fresh and bright world, and the latter created a fantasy, rigid and dark world. Rozanov created religion of life. His literary criticism embodied the thinking of religion, literature and social problems, and these thinking were all through the refraction of the prism of life.

Key words: Rozanov; literary criticism; Pushkin; Gogol

[责任编辑: 郑红翠]